



小国文学的启示

——以洪都拉斯作家奥维德小说创作为例

赵德明

摘要：在拉丁美洲的文学史上，小国家产生世界瞩目的大文豪和伟大作品的奇特现象，深层次地反映出文学与社会现实、与历史、与民族性等关系问题。以中美洲洪都拉斯作家霍尔赫·路易斯·奥维德小说创作为例，可以发现：关注社会现实，以文学认识国民性，叙述一个民族的精神成长，是其小说创作的根本取向所在。在奥维德的小说中有全新的文学观念和社会、历史观念，他的觉悟和认识水平得益于本土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相结合，得益于20世纪百年历史的巨变之契合，得益于与优秀的世界文学的大融合。

关键词：奥维德；小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观念

我们在研究拉丁美洲文学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一些小国家里却产生了大文豪和伟大的作品。例如：智利的聂鲁达和米斯特拉尔、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危地马拉的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等等，他们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创作出了辉煌而不朽的文学作品。这个现象让笔者想起了文学与社会现实、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有意选择了中美洲的洪都拉斯这个面积只有十一万两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五百万的小国家，看看那里的当代文学发展状况，看看那里有没有像阿斯图里亚斯那样优秀的作家。调查的结果让笔者的眼睛一亮——他山之石给了我一些意外的惊喜和启示，现在公布出来，与读者共享。

当代洪都拉斯文学的代表人物名叫霍尔赫·路易斯·奥维德。他坚持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坚持文学必须反映社会生活，但是生活素材必须根据作家的个性和艺术追求、通过特殊的文学手段进行加工处理，尤其是要充分调动艺术联想能力，去实现作家自己的美学追求。奥维德把民族的历史事实看作是文学认识国民性和民族精神的成长家园。在这样的文学思想指导下，洪都拉斯的当代文学生产出一些思想性和艺术性很好的作品，赢得了读者的赞誉和信任，文学在老百姓的日常文化生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拉丁美洲文学评论界认为洪都拉斯的当代文学、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小说，无论艺术风格还是思想内容的深刻和丰富方面，都是洪都拉斯文学史上的最佳时期。

但是，洪都拉斯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拿文学当成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饥饿、贫困、战乱使得民不聊生，老百姓能够勉强活着就已经不易。霍尔赫·路易斯·奥

维德回忆那个年代时说：“只有种植鳄梨、玉米、菜豆，填饱肚皮才是正当的生活，很难想到为少数读书识字的人们写作是必要的”。可是，残酷的实现恰恰逼迫这位作家思考苦难产生的根本原因。他感觉有强烈的愿望要替饥寒交迫的人们呐喊。而文学是揭露丑陋现实的有利武器。他作品中的环境、人物故事都是为了再现洪都拉斯的日常生活的，都与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贴近，因此，他的作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这集中反映在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之中。这三部作品是：《死者的荣耀》、《土耳其女人》和《像我们将军这样的没有第二位》。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作品，笔者认为很有必要了解洪都拉斯的简单历史，因为洪都拉斯的国情特色决定和影响它的文学形成和发展。文学是一个民族精神状态的晴雨表。在1502年西班牙征服者到达洪都拉斯之前，那里的土著印第安人已经创造了灿烂的玛雅文明，高大的庙宇建筑、发达的制陶工艺、金银首饰工艺就是证明。文艺方面有歌舞和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西班牙人来到之后迅速与土著女人通婚，产生了混血的后代。这个混血的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经历了长达500年欧洲人与土著印第安人的混血经历之后，2002年的洪都拉斯的全国人口中，95%是混血种人。在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下，土著文化迅速衰落，口头文学绝大部分失传。洪都拉斯的文学史只好从模仿西班牙文学模式写起。从1521到1821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洪都拉斯连初级教育体系都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图书馆，没有剧院。殖民者的子弟需要到邻国去上学。有两位传教士写过一些田园诗和游记散文。仅此而已。1821年洪都拉斯像中美洲其他小国一样宣布独立，成立了共和国。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几乎没有文学作品产生。但是这50年在经济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吸引外资，创办香蕉农



场,开矿山,修公路,引进电话,办邮政,建立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确立了民法、刑法和教育法,设立了全国初级教育体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文学活动准备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到了1871年以后,一批作家纷纷登上文学舞台,例如,诗人和小说家胡安·拉蒙·莫利纳、长篇小说家露西拉·卡梅罗·德美地纳、诗人弗洛伊蓝·图尔西奥、拉法埃尔·艾利奥多罗、阿尔丰索·吉莉安·塞拉亚,等等,他们的作品不仅受到本国读者的欢迎,而且在中美洲各国流传。从文学流派上讲,他们的作品属于浪漫主义。但是,小说开始关注洪都拉斯的社会现实生活了。20世纪初,尼加拉瓜著名诗人鲁文·达里奥的现代主义文学主张和作品极大地影响了洪都拉斯文学的发展。在头20年里,洪都拉斯的诗歌对世界大事开始关注,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扩张政策,因此对风花雪月、向往异国风情的现代主义时尚开始表示怀疑。到了20世纪30年代,欧洲先锋派文学诞生,这对于洪都拉斯的文学来说,意味着告别单一文学流派,走向多元发展阶段,从而开始了文学民众化的路程,但是模仿外国时尚的风气仍然占据主导地位。1933年至1948年期间,卡利亚斯·安迪诺实行独裁统治,为美国垄断资本逐渐控制全国的经济命脉提供了方便之门。但是,作家并没有积极投入到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去,而是回避残酷的现实生活,去描写田园生活和情欲泛滥的故事,因为那时的文学属于上流社会。1951—1962年国民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这个时期的作家仍然没有反映独裁制度下的社会生活。但是,作家的创作明显区别于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命运是与底层的人们联系在一起。1963年埃雷利亚诺将军夺取了政权,开始了军人执政时期。军队成为国内最强大的政治力量。直到1982年自由党人苏亚索出任总统,军人治国的形势方才改变。1986年阿斯科纳继任总统,签署了《中美洲和平协议》,洪都拉斯进入和平稳定、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但是,在1986年之前,中美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而令全世界瞩目,例如,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的战争、美国与巴拿马关于运河的谈判、尼加拉瓜桑蒂诺阵线的革命胜利,这些事件大大激励了作家们的创作激情。霍尔赫·路易斯·奥维德的创作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

霍尔赫·路易斯·奥维德属于洪都拉斯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这一代作家主张文学应该对民族有所承诺;他们讲究作品要有思想性,讲究创作要有艺术技巧,讲究语言的地方特色,追求文学价值。这些特点与拉丁美洲文学在60—70年的先锋派主张有密切关系。奥维德本人是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多面手,在诗歌、短篇

小说、长篇小说、散文和文学理论研究上都有建树。文学评论界公认他是洪都拉斯当代文学的代表。到2007年为止,他的各类作品已经出版十余种,被翻译成英文、希腊文、德文和意大利文。他的文学论文发表在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学术刊物上;一些文学评论文章发表在墨西哥的至上报、波哥大的观察家报、尼加拉瓜的街垒报的专栏里。1982年他同时获得了巴拿马大学颁发的中美洲诗歌奖和中美洲小说奖。

1957年霍尔赫·路易斯·奥维德出生在洪都拉斯的科马亚瓜省的自由镇。童年时期就接触到了文学读物。中学时,他大量阅读了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进入大学后决心研究文学。2002年,他一面从事文学创作,一面在中学和大学教书,是大学文学教授。在奥维德成长的道路上,有三位拉丁美洲的作家给他的影响最大,他们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和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特罗索。

蒙特罗索是善于写短篇小说的大师。他最短的小说只有一句话:“当他醒来时,恐龙仍然在那里。”这句话发表在文学专栏之后,曾经在读者中引起热烈讨论,因为它给读者留下了无穷尽的遐想空间和悬念。这种简短而有回味的艺术风格让奥维德感到惊喜,也让他产生了灵感,创作了两句话的小说《肯定无知》:“上校丢失了死亡清单时就停止了枪毙活动。他坚信那些数字永远结束了杀戮。”也一时流传在老百姓中间。

墨西哥著名作家胡安·鲁尔福也是写短篇小说的高手。中国翻译、出版了《鲁尔福短篇小说集》和他的中篇小说《人鬼之间》。还翻译、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中国读者对这两位拉美作家有一定的了解。奥维德认为这两位作家“把日常生活转化为文学元素的技巧令人拍案叫绝”,他非常欣赏鲁尔福处理《人鬼之间》结尾的技巧。他在自己的作品《死者的荣耀》里,用同样俏皮的手法描写了这样一个平时骄横、作威作福的恶霸,面对愤怒的群众表现出无能为力的狼狈神态:

就在我们看见大地主拉蒙转过身的时候,他屁股上赫然露出一朵白玫瑰,不知什么人巧妙和幽默地贴上去的,由于他化妆得怪模怪样,发型、像鸡巴一样的项链、皮靴和头发之间的反差,那朵白玫瑰显得格外清晰。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奥维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处理现实素材的艺术技巧上。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根据哥伦比亚热带地区产生飓风的自然现象,常常有龙卷风把人和动物席卷到空中的事情发生,描写了俏姑娘升天的故事,暗示俏姑娘有了外遇:



“外来人认为她家是在用升天的谎言来挽救名誉。”奥维德认为这样虚实结合的手法可以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就在短篇小说《镜中的面孔》里安排美女罗莎乌拉跟情人胡里奥逃跑了，美女的父母为了掩人耳目，就四处散布说“女儿升天了”，因为是家里的一面镜子常常显现女儿的面孔，告诉父母她在天堂里生活愉快。

值得注意的是奥维德在向优秀作家、作品学习的同时，始终坚持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和认识与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艺术想象力相结合，开创出自己的艺术风格。他之所以坚持要表现洪都拉斯的现实生活，因为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他无法回避独裁、战乱、饥饿、贫困等等威胁着民族生存的“要命”问题，他说：“洪都拉斯属于第三世界，民族生存问题不是抽象的，而是残酷和要命的。”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相信作家的思想感情是有阶级属性的，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的独裁统治，要么当压迫者的帮凶，要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参加反对压迫阶级的斗争。这个观点在短篇小说《相遇》里表现的非常明白。两个童年时期的小伙伴，长大以后再度相遇了。但是，一个当上了军队的上尉军官，一个是罢工工人的代表。这位工人代表清楚地认识到：“政府派遣军队欺负老百姓，自以为是主宰天下的，永远不会倒台，其实只要大家团结起来，他们肯定要完蛋……”那位上尉军官虽然知道工人的罢工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一句“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就把这个“硬道理”给否定了。上尉就站到了反人民的立场上去了。严重的阶级对立形势迫使作家做出了“为民代言”的抉择。奥维德坚决站在人民这一边，用自己的笔去揭露和批判反动派。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奥维德不赞成把文学作品变成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不想把自己的作品变成“政治宣传品”。他认为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作家这样的态度上：不逃避现实，也不要把现实加工成政治标语牌，而是应该对现实进行虚构和联想，让艺术的因素充满作品的空间。他说：“在物质环境、虚构的故事人物和现实之间，几乎总是存在自动的对应关系，作家的主要力气应该放在艺术联想力的发挥上。”为了解决好这个“对应关系”，他认为把故事定位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中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土耳其女人》一开篇就确定了情节发展的位置：“1975年7月19日星期六，黎明时分，土耳其女人被驱逐出村，罪名是她扰乱治安和教唆儿童干坏事。三百多名歇斯底里的女人和一名教士愤怒地用担架把土耳其女人抬出了村口……”又比如，在《死者的荣耀》里，作者写道：“在拉蒙的下葬过程中，村子里去围观的人最多，因为他实在太招人仇恨了……”这样的“村子”不仅传达出地理位置概念，

而且说明了故事发展的群体。奥维德特别偏爱农村的原因，与他对农村的认识有密切关系，他说：“洪都拉斯的现实生活场景是非常残酷的，尤其是农村，只要把这个舞台在作品里构建起来，真实性就有了保证。”

奥维德认为，应该把虚构和联想的主要力气放在人物性格的发掘上。他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有社会生活的原型，都有各自存在的理由和故事。但是需要作家运用艺术语言的可塑性来塑造人物富于诗意的形象。为此，他特别注意方言、土话、黑话、脏话的运用，因为它们可以有效地服务于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他说：“在洪都拉斯的农村没有文言文和大众化方言的区别。日常口语可以生动和忠实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但是，方言不能滥用，它必须经过加工，要与人物的性格、身份、情绪保持一致。”

奥维德的叙事艺术特点首先表现他敢于直面20世纪洪都拉斯的重大历史事件，敢于揭露重大事件背后的本质。当时的政治形势动荡，政府镇压人民群众的抗议活动，美帝国主义与反动派沆瀣一气，疯狂掠夺洪都拉斯的自然资源财富，这些都是洪都拉斯20世纪历史发生的事情。作家敢不敢直面这样残酷的现实，是考验作家有没有起码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一个作家如果回避饥饿、贫穷、血腥镇压、独裁统治的社会现实，而去追求风花雪夜的浪漫情怀，只能说明他采取的立场和写作态度是个人主义的罢了。奥维德的胆识表现在“敢于触动最高统治者和触及重要的历史事件”（尼加拉瓜作家、评论家塞尔西奥语），总统、总司令、独裁的军阀都是他作品抨击的对象；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土地上干下的罪恶勾当、军队首脑发动的军事政变、各个政治派别为了争权夺利而展开的阴谋活动都是他揭露、批判的目标。比如，他的作品中详细叙述了1932—1949年卡利亚斯的独裁统治，这个独裁者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一再修改宪法，一再延长掌权的事件，一再用自然资源来答谢美国的帮助。他在短篇小说《最受欢迎的死神》里这样写道：“在卡利亚斯执政期间，全国建立了稳定、持久的和平秩序，根除了盗窃、饥饿、卖淫、文盲、求乞等丑恶现象，具体办法就是对上述人员直接进行肉体消灭，把他们的尸体涂上闪亮鲜艳的颜色，在圣诞节期间，悬挂在主要城市的公园树上。”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卡利亚斯在位17年，他执政的口号是：“用监禁、流放和枪毙实现和平！”他相信“稳定是压倒一切”，因为只有政权稳定了才能发展经济。果然，在他执政期间，政府偿还了外债，修建了许多学校，完成了泛美高速公路的修筑，建设了国家航空港，军队实现了现代化，改善了社会福利体系。卡利亚斯成为一个性格矛盾多变、十分有争议的人物。奥维



德认为这恰恰是个很有文学性的角色,应该写出卡利亚斯的复杂性,因为这是社会历史时期风云多变在领导人性格上的反映,写出了卡利亚斯的复杂性,也就浓缩了时代的特点。

奥维德特别喜欢的另外一个题材就是军队,确切地说,就是军民关系的题材。洪都拉斯的军民关系在20世纪始终是非常紧张的,因为在1956、1963和1972年军队首脑发动了三次政变,成功地篡夺了政权,用军队首脑“钦点”的办法任命各级军官担任政府领导职务。于是,武装力量成为左右国家政治生活的独立力量:只要出现政局不稳的情况,军队就会出来干政。对此,奥维德这样写道:“总统府午夜的钟声敲响了。总统阁下已经沉沉入睡。早晨七点钟,总统醒来时感觉自己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如同往日一样,他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拉开窗帘。在一刹那间,总统以为自己还在梦中,因为洼地里那条河流消失了。可是,他清醒过来以后,发现那条河仍然从自己家中后院流淌过去。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总统方才明白:就在他睡觉时,军人发动了政变。”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军事政变乃家常便饭也。

奥维德敢于触动的另外一个重大题材就是美国政府对中美洲事务的粗暴干涉行为。20世纪80年代,中美洲出现了反独裁专制斗争的高潮。美国政府以防止共产主义扎根中美洲为理由支持洪都拉斯武装力量总司令古斯塔夫·阿道尔沃打击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阵线,仅在1980至1982年期间,就为洪都拉斯军队提供了5亿7千2百万美元的援助,用于购买先进的军事装备和收买少数军队领导人。在白色恐怖下,奥维德不怕打击、迫害,在《像我们这样的将军没有第二位》里那样,通过军人班长安图内斯的嘴巴直接点名讽刺总司令古斯塔夫。他说:“里根总统给我们总司令颁奖,接着他在白宫前面拍照,送给他华盛顿的城市钥匙,这些示好的行动可不是免费的餐券啊……”的确不是简单的友好表示。作品深入揭露出美国政府、洪都拉斯军队和总统三股力量结成了联盟,对内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游击队的出现,对外抵抗尼加拉瓜游击队的进攻。奥维德详细讲述了古斯塔夫在洪都拉斯的领土上训练萨尔瓦多雇佣军的情况,其实他是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是换取美国军援的一个条件。奥维德触动这些重大事件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是,他认为既然自己是这些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就有责任把真相告诉后来人。

由于奥维德有这样的认识,他就把目光投向演绎这些历史事件的人们身上。从《土耳其女人》、《死者的荣耀》和《像我们将军这样的没有第二位》的主要角色来看,普通老百姓、将军和总统都是作者注意的对象。他认为这些人都有代表性、典型性和个性;其个性中的

复杂变化与历史事件的演变有着紧密的对应关系。而只要抓住了这个关系就抓住了故事情节变化的“密码”,因为是人物言行的变化决定着故事情节的存在和发展。比如,土耳其女人怪异的个性和反常的行为制造出许多震动乡里的事件。再比如,《死者的荣耀》的主角拉蒙和《像我们将军这样的没有第二位》的将军,他们性格的核心是为了巩固政权而滥用职权和残酷镇压造反的群众。从这三部作品主人公的最后命运都是悲惨的下场来看,作者的态度是明确无误的:否定和批判独裁专制统治。

下面对这三部作品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死者的荣耀》发表于1992年,主角拉蒙是个军区司令。他的性格特征是冷酷和残暴。少年时就杀过人,犯了罪。不到21岁就已经杀了38人。此外,还率领团伙拦路抢劫杀人近百。他杀人时面不改色,被人们称之为“冷血”。后来在内战中投降了政府军,由于作战勇敢、连打胜仗而获得国家元首的奖励,封他为“钦点代表”。他拿着“尚方宝剑”去农村查看民情,一发现有造反的苗头就抓人和杀人,造成一片恐怖气氛。镇压越烈造成的仇恨越深。血腥镇压的结果是迫使村民奋起反抗。拉蒙在革命的烈火面前被迫下台,不久病故。老百姓欣喜若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

《死者的荣耀》的故事情节通过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展开。叙述者是个普通的村民。他用“我在现场”的口气讲述,因此有说服力。这位叙述者就是在恐怖的环境里长大的,他的兄弟一天突然失踪了,不久有人发现河里漂浮着一具尸体,人们打捞上来一看,是叙述者的兄弟,他身上有枪伤。叙述者知道这是拉蒙的部下所为。为给兄弟报仇,叙述者参加了武装起义,直到推翻了拉蒙的政权,参加了庆祝拉蒙之死的晚会为止。但是,叙述者讲述这个故事的时间已经是在拉蒙死后十五年了,而且地点不是在村里,而是在首都的一家酒吧里,听者是他的表弟。二人聚会的目的是庆祝拉蒙去世15周年。叙述者的第一句话“拉蒙下葬的时候,村里围观的人是空前的。谁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惹人恨。”这句话与扉页上的题词“此人死得恰逢其时,人们开晚会庆祝,因为暴君死了。”结合在一起,构成全书叙事结构的基础。通过这两句话,读者立刻知道这部作品讲述的故事与暴君统治有关,与暴君死后人们欢天喜地的情绪有关。句子里的“下葬”意味着暴君统治的结束,意味着苦难时期的结束,意味着相对宽松和自由时期的开始,所以叙述者讲述的口气是轻松的,充满了驱邪的力量和报复的快意。但是,恐怖和镇压的阴影仍然令人心有余悸。因此叙述者说道:“半人半鬼的拉蒙带着队伍进村的时候,狗叫,鸡鸣,孩子哭,大人



喊……”听者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值得注意的是，拉蒙的队伍进村以后驻扎在教堂里，并没有遇到什么人反对，因为村里只剩下了妇幼和老弱病残。年轻力壮的人们都躲避政府的追捕，上山打游击去了。孤寂和荒凉的气氛增加了拉蒙对村民的威慑力。作者这样描写拉蒙杀人时的变态心理：“他像魔鬼一样夜间出行，蹑进居民住宅里抓人，杀人，然后把尸体扔进河里取乐。”为了表现拉蒙怪异的性格，作者用许多笔墨描写拉蒙戏弄和嘲笑神甫的场景以及与荡妇寻欢作乐的场面。而这样的描写与拉蒙制造出来的恐怖气氛、老百姓经受的灾难形成暴君欢乐和人民吃苦的强烈反差，从而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冲击力。

在《土耳其女人》里，奥维德选中了一个流动女商贩做主角。作品一开头，她经常出现在村子里，出售袜子、衬衫、针线百货。她能说会道，逐渐赢得了村民的信任。直到14年后，她才被天主教神甫和一些女信徒驱逐出村，原因是她引诱一些少年犯罪。她辗转来到塔兰卡市定居，由于善于经商，不久便东山再起，发了大财，名声显赫起来。于是，她就出现在部长、外交官、总司令，甚至总统府上了。这个女人的性格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物欲和性欲。发财是为了满足她的物欲，寻找身强力壮的男子是为了满足她的性欲。整个作品围绕着这一性格特征展开：为了满足这两种欲望而折腾，失败了，再折腾，再失败，再折腾……直到她由于过分肥胖而摔倒在地造成了地震方才罢休。但是，尸体下落不明。在她折腾、失败、再折腾、再失败的过程中，作者刻意描写了她顽强的毅力。比如，在她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性伙伴之后，不料此人竟然猝死在婚床上。这给她的打击很大，让她沮丧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是她性格中那不安分的欲望叫喊着还要折腾。于是，她收养了几个马戏团里的侏儒做性工具。几周后，她从侏儒们卑躬屈膝的态度里找到了自信，重新过起了开心的日子。许多城里的居民佩服她顽强的性格：“无论她的言谈举止多么不稳重，咱们城里人不得不佩服和欣赏这个胖娘儿们的顽强劲头……”。

为了突出《土耳其女人》倔强性格，作者还描写了她特立独行的脾气。例如，她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就四处寻找彪型大汉。这招致了神甫的责备和邻居的议论。她全然不予理睬，我行我素，终于与一个有劣迹的“江湖好汉”结了婚。原因很简单这个名叫撒卡顿的汉子有着硕大的阳物，浑身充满了雄性美。这正是“土耳其女人”寻找的对象，她岂能放过。至于什么“劣迹”，她才不加考虑呢，因为她的“劣迹”难道比撒卡顿少吗？何况这种“乌龟找王八”的选择还有她深层的认识基础呢：她从小就认为自己是魔鬼的化身，生下来就是拆毁

教堂的，就是揭穿神甫“伪善”面孔的。她这样愤怒地骂道：“别让那些臭教士来什么道德说教！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过得是什么生活！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个混蛋神甫在村子里有多少私生子！”作者有意塑造主人公复杂多变的性格，既为了通过她的变化折射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也为了让人物活灵活现、生动逼真。

在叙事技巧方面，作者设置了一个“无处不在，无所不晓”的叙述者。他叙述的口气朴素，真实，使用日常口语，不时地插入一些花絮，避免单一的叙述会产生乏味的感觉。另外，作者还不断插入一些剪报，给故事增加了时代感和新鲜感。

《像我们将军这样的没有第二位》是奥维德的代表作。发表于1990年。从书名上看，似乎是一部歌颂将军功劳和美德的作品。将军在这里是个代称，代表一个具体的军人。作者始终没有说出将军的真实姓名。但是，随着情节的展开，中美洲的读者都会猜出将军的真名实姓，那就是古斯塔沃·阿道夫·阿尔瓦莱斯·马丁内斯。此人在洪都拉斯当代历史上是个有争议的人物。1938年出生，青年时在阿根廷读书，1961年毕业于阿根廷军事学院。信奉基督教新教。曾经担任洪都拉斯武警司令。1982年升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在任期间主张与萨尔瓦多政府军联合镇压游击队；主张建立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军事同盟，共同对付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和萨尔瓦多游击队。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坚决镇压左派政党的活动，对革命者实施绑架、刑讯和秘密杀害。

作者设置了一个叙述者，身份是军队里一名班长，名叫安图内斯。他一开始就用歌功颂德的口气赞扬将军的丰功伟绩：“从1969年的战争以来，我们的将军屡建战功，政府授予他很多奖章。您要是看看我们将军家里墙上挂的证书和奖章，就知道将军的地位是多么重要了……”特别有趣的是，安图内斯讲述出来的一些事情本来是要赞扬将军的性格的，结果读者听起来好像他是在说反话，比如，将军对妻子的不忠行为，有性虐待狂的倾向和残暴的性格。将军请示教皇：“消灭共产党算不算犯罪。”教皇回答说：“不算犯罪。恰恰相反，消灭共产党就等于是惩罚魔鬼。”从而暴露了将军反共的立场。按照作者的设计，班长安图内斯属于这样一个社会阶层：“他非常无知，一味盲目地服从上级，上级反共他就跟着反共，迷信上级，迷信神灵，思维十分混乱，历史观念扭曲，把丧尽天良当成天经地义……”他们成为反动派的实行专制独裁的土壤，有了他们，将军们才能倒行逆施，滥杀无辜。

在虚构和真实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是《像我们将军这样的没有第二位》的成功经验。这部作品真实反映



了洪都拉斯自1963年进入军事独裁时期的历史特征。书中是这样概括的：“饥饿，贫困，瘟疫，政局动荡，社会道德沦丧，用稳定来镇压群众的不满，地方势力勾结国际力量密谋分裂活动，通货膨胀，农业凋敝，缺少教育机构……”于是，乱世出了“英雄”，将军是来拯救国家的，按照将军的说法，“治疗国民的病痛就需要铁碗。”为了表现这样混乱的社会状态，班长的独白也是混乱的，毫无逻辑和章法可言，他的叙述是跳跃式的，没有清楚的铺垫和过渡。甚至可以说没有完整的情节，因为作者给叙述者规定的任务，就是“向读者说明情况”。但是，随着叙事的逐步展开，虚构和现实生活之间就出现了一条通道：班长在讲述真实情况的前提下，不断运用想象力使情况丰富多彩，从而建构起一个新的艺术虚构世界。

那么这算不算魔幻现实主义呢？

由于洪都拉斯在20世纪80年代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社会生活是压抑和扭曲的，现实里有许多荒诞因素，作者抓住这些因素加以表现，给读者的印象似乎是魔幻手法，实际上，里面并没有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那些手法，例如，心灵感应术、人物飞翔升天、气功遥感控制等等。但是，疯狂、扭曲的历史事件本身不断呈现眼花缭乱的魔幻现象。这些现象本身就是现实。魔幻和现实就是一体。这就是奥维德反复强调的：我的每个故事都是真实的，作品就扎根于现实生活之中。至于作品中那些像魔术般的突变，都有真实生活素材的基础。比如，杀人不眨眼的将军居然在作品的结尾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摇身一变成为基督教的传道士。班长说：“将军受了洗礼，做了忏悔，领了圣餐，成了信仰坚定的教徒了。”但是，随后班长解释说，将军从骨子里就不尊重别人的生命，也不尊重《圣经》的教导，将军的入教是在利用宗教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他被迫下台以后，他的随从早就作鸟兽散了。作者在真人真实故事的基础上做了语言方面的艺术加工，忠实地记录了那些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

奥维德的创作给我们的启发是多方面的。

首先，文学家对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应该是非常敏感的，应该得风气之先，应该见微知著，比天气预报专家的感觉还要超前。

其次，对于社会生活，哪怕是日常生活，作家要思考、分析、对比，尤其是置疑：现存的就是合理的吗？置疑需要勇气和胆识，因为需要否定自己的观念，需要否定陈腐的传统观念，需要分析时尚，需要发现人们在一个时期里认识的局限性和盲目性，这些都需要勇气、学识、智慧和科学的观察方法。

第三，要认识文学创作的特点。文学可以拥抱和涵盖历史、哲学、经济、政治，但是文学有自己的特征和要素，它不能也不应该代替历史、哲学、政治、经济。以小说为例，人物，故事情节，场景，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更为重要的元素是，小说总要表现或者反映人物的思想感情，这是小说的看家本领和首要任务。小说家必须扎根于生活。而进入创作状态之后，他的想象力就变成主角了。没有丰富的艺术联想能力，不可能有优秀的作品。语言艺术的实践是小说家的基本功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了。

最后，奥维德的小说创作实践还告诉我们：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洪都拉斯与中国相比是个小国，文化传统的年代也不像中国那样悠久恒远，但是，奥维德的觉悟和认识水平得益于本土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相结合，得益于20世纪百年历史的巨变之契合，得益于与世界文学的大融合，因此他具有全新的文学观念和社会、历史观念，他的作品就是科学发展观的产物。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作者系原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翻译家、拉美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黄恩鹏